

# 吴雷川：生性迂执，穷老益坚

◎ 两浙人物    □ 周维强



北平沦陷后,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侵略军封校,教师失去教职,也断了固定的收入。执教燕京大学的吴雷川先生(原籍浙江杭县)也不例外。周作人托人邀请雷川先生到“北大文院”任教授,“不必授课,而从事指导工作”。这自然也可以视作是周作人想给予雷川先生以帮助,雷川先生婉却了周作人的邀请,他在1942年6月10日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当时给周作人的答复:“现时生活尚可自给,故对此不需要,如将来至不能写字谋生事,当领盛情也。”话说得很客气,但雷川先生直到1944年去世,都未曾到过“伪北大”任职。更早一些时候,1942年2月12日,雷川先生拒绝王揖唐邀其出任伪职的信函里有明确的表达:“雷川生性迂执,穷老益坚,固维怀在得之愆,严效不恭之却,夙报食贫之愿。年华老迈,戒之在得。”行文雅致,意思则很明确。

燕京大学被关闭后,雷川先生主要以鬻字为生。这些在日记里也有记录。比如1942年的日记,在1月17日中记载:“为集兴商行写扇面一页。”1月18日的日记里记载:“去信:……集兴商行(并扇页及润例,取润资)。”1月25日记载:“为清秘阁写屏一幅。”1月28日记载:“为集粹山房写五尺屏一幅。”2月17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具体的一个润例:“林庄既去复来,称其叔之命,以百元见赠。余不便固辞,因其已有四件属书页。惟按照书件得润只可五十余元,今所赠之数过于所应得之数,故告林庄,拟请其叔再开示数人之上款,当照写寄往。总期其数略裕,于心始安。”5月9日日记里保存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抱定自食其力之宗旨。计每月写字得润平均总可得八十元,约不足二三十元,现有积存款七百元,约足救两年之贴补……”6月5日的日记里保留了改订过的润例:“四、五尺屏条,每条十元、十二元。三尺六、八行屏条,每条十、十二元。四尺七八言对联,十二元。四尺十二言长联加跋,二十四元。三尺横幅,四、六百字以上,十六、二十四元。四尺横幅,一、二千字以上,四十、六十元。折扇面单、双行,十二、二十四元。册页,十元。寿屏,四、五尺者,每幅十二、十四元。碑志,每百字

三十元,每字以寸余至二寸为限。外加墨资一成。除寿屏外,蜡叶纸及泥金纸均不书。除寿屏及折扇面外,所用同宣纸,只须开明尺寸,皆可代备,不另计费。”雷川对这份改订过的润例亦有说明:“校原订者不欲多有增加,因拙书本无足睹,不敢高抬价格也。”学生帮助自己代为销售书法作品,雷川亦可嘱:“倘销售为难,万不可强派,仍将原件寄回可也。”这是致沈季琴的信里说的话。这封信保存在1942年8月3日的日记里。

乱世中不事伪职,以鬻字谋生,这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人里也是有传统的。比如明清鼎革之际,山西人傅山也曾以鬻书卖画贴补生活。白谦慎著《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一书里解释道:“明清鼎革并非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并未受到根本的冲击。”中原人士在文化上“依然保留着旧时的爱好和品味”,傅山的名望也使许多人希望收藏他的作品,“在家中悬挂傅山的书法意味着一种社会身份”。这个解释也许也可以移用来说明雷川先生得以鬻字为生的一个社会文化基础。雷川先生1942年1月28日的日记里记录,韩国人金本武雄慕名谒见雷川,“且欲乞余为书字幅也……”。2月16日的日记又记录金本武雄“代其戚松本兴治乞书中堂对联”。这个例子或可表明雷川先生已享高名,笔墨亦为人所愿意珍藏。

饶有意思的是,雷川对傅山的书学理想亦颇认同,1933年8月9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傅山关于书法的见解:“学书之法,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率真毋安排。”这一段记录后加括弧注明“傅青主先生语”。傅山这个著名的书法见解,出自他的《训子帖》。雷川引的文字“率真”,我在其他的本上看到的是作“直率”。几天后,8月21日的日记里,雷川先生再次引述傅山的这几句话,雷川并且发挥道:“余以为不特学书之法如是,即作人之道亦当如是也。”

雷川以所写字获得润资,但也不是都会收取润笔。比如1943年4月26日的日记记载:“写《正气歌》一幅赠周焕文,因其乞书并欲致润,故即以赠之而不受润也。”周焕文系雷川燕京大学文学院之同事。也有不相识的求字而不收费的,举一个例子,1942年9月26日的日记里记载:“上午常蕴璞来,言有大中学校校长张作民乞书屏幅。又平中教务员号嗣延者,亦乞书一屏幅,并携来润资廿二元。余以大中校长之润资当照收,平中教务员某君之件可不收润,遂收十二元。”推想起来,也许雷川先生以为教务员较校长收入为低,故不予收取润资?

雷川鬻字,对自己所书写的,也是严谨认真,不肯以自己所不满意的字幅拿出手。比如1941年2月17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条:“晚饭后为郑以业写五言联一副,不惬意。又重写一幅。”再比如1942年4月18日的日记里也有这样一条:“为清秘写七言联,又重写一联,皆不惬意,明日尚拟重写。”雷川接着又写道:“于此见工力之浅。”第二天的日记里记载:“为清秘重写七言联一副,作隶书,乃稍可应付。”清秘,即清秘阁,北平琉璃厂一家老字号南纸店,店名源自宋代书画家倪瓒的藏书号。清秘阁始创于清乾隆年间,传说店名也是蒙乾隆皇帝所赐。民国年间,蔡元培、胡适、齐白石、溥心畲、鲁迅等文教名流均与清秘阁过往密切。

动乱世事,雷川先生既然以鬻字为生,所以有暇也就常常临帖习字,以1942

年1月的日记所记载的为例,这个月的日记里,有20天记载了临帖习字。这个月里雷川先生临习的法帖计有:《修孔庙碑》、智永《千字文》《霖雨桥记》、文征明《千字文》《褚临兰亭》、米芾《褚临兰亭跋》、陆柬之书《文赋》、唐玄宗《鹤鸽颂》、金冬心隶书《六朝名贤赞事》。这是写了具体的法帖名字的,还有几天所临习,未写明具体的帖名,如1月24日“习宋人书册”,1月30日“习元明人书册”,1月31日“习明清人书册”。法帖上迄北朝东魏,下逮明清,几乎包罗了诸体。这也显见得雷川先生临帖习字也是有博取众长的气度的。1月13日的日记里说“从绍虞处借得《支那墨迹大成》第一卷观之”,这是鉴赏历代法帖。《支那墨迹大成》,日本河井荃庐监修,收录中国晋唐至明清的书法名家墨迹,其中包括了虔藏于日本的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本、赵孟頫小楷册页《汲黯传》等。河井荃庐,即河井仙郎,荃庐是他的字,日本印宗师,治印专宗秦汉,风格浑厚古朴;书法则早期劲健峻拔,有六朝风韵,中年书风转而潇洒有金石气。河井也是西泐印社名誉社员。绍虞,即郭绍虞,治古典文学、语言学,书法造诣深厚,当时也在燕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

雷川先生除了鬻字维持生计之外,也曾典卖所藏图书以贴补日常之费。1942年3月17日日里里保存了一封信,信里写道:“至本月始生活问题一为取资于字润,已往两月,幸可维持。兹为稍储余粮计,尚拟将书籍数种出售。”雷川先生开列的拟出售书单里,有《越缦堂日记》五十一册八函、《定山堂诗集》十六册八函、《内经评文》八册、《满洲实录》(附图)八册、《西园闻见录》四十册八函、《商周彝器通考》两册、《善斋彝器图录》二册一函、《武威殿彝器图录》二册一函、《颂斋吉金图录》一册、《颂斋吉金续录》二册一函、《汉武梁祠画像录》二册一函等,总计四百廿五元,“拟实售三百元”。雷川先生的这些藏书者也可以见出他的学问修养的一部分,见出他的阅读趣味的一些方面。

由雷川先生出售藏书兼及雷川先生的阅读,还可提一下的是,新文学作品也是在他的阅读范围内的。1942年3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道:“看巴金所写《爱情的三部曲》总序毕。”巴金小说《爱情的三部曲》,第一部《雾》,上海新中国书局1932年5月初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列入“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1月20日再版;第二部《雨》,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3年1月1日初版;第三部《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3月20日初版。后两部也列入“良友文学丛书”。1936年4月30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又合订这三部曲以《爱情的三部曲》为书名列为“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出版。“良友文学丛书”和“良友文学丛书特大本”均为赵家璧策划出版。前者自1933年1月1日至1937年6月30日陆续印了39种,后者则自1936年1月20日至1936年7月30日印了4种(参见朱金顺《新文学史料学》,海燕出版社2018年5月版)。良友出《爱情的三部曲》合订本时,巴金写了一个“总序”。巴金是当时青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家,雷川先生以教育家而读巴金作品,既表明巴金的影响,也说明作为教育家的雷川先生愿意了解青年、理解学生。这也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雷川先生信函里所述的“生性迂执”这话语是要表明自己在国难劫时时刻的持志守节,而不是真的说自己不明世事、不通人情。

◎ 史林偶拾

## “老爷子”朱旭的小纸条

□ 张达明

人称“老爷子”的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先后在《哗变》《左邻右舍》《北街南院》《芭巴拉少校》《屠夫》《甲子园》等经典剧目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形象。而在影视领域,先后主演了《变脸》《洗澡》《刮痧》《我们天上见》等电影,并凭《变脸》获东京电影节最佳男演员,还出演《末代皇帝》《似水年华》《日落紫禁城》等电视剧。他的表演,不着痕迹而又精准到位,风格以风趣幽默、细腻传神著称,其周身散发的悲悯气质在众星云集的北京人艺独树一帜。

朱旭并非科班出身,而且“先天不足”,因口吃,个儿大,自称“傻大个儿”,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每次演出时,他都会随身带着一些小纸条,上面密

密麻麻写满了台词,在一场戏演出前,他总要先掏出一张小纸条,将自己在这场戏中的台词温习一遍,这才胸有成竹地上台,一场戏演完后,他又会立马再掏出一张小纸条,来温习下一场戏的台词。

小纸条成了伴随朱旭舞台生涯的一个标识。《甲子园》是朱旭舞台生涯的谢幕演出,虽然戏份同以往演过的主角相比少了许多,但依然少不了小纸条的陪伴。他扮演的“半仙儿”一出场,一股熟悉而亲切的味道便扑面而来——虽然这是一个神神叨叨没有什么文学含量的人物,但朱旭却以特有的沉稳节奏和幽默感,老老实实在地塑造着这个小角色,让人物焕发出了光彩。

正是因为有了一张张的“小纸条”,朱旭“老爷子”才从来没有演错过戏,最终成为一代表演艺术大家。

## 宽容的深度

□ 唐宝民

宋真宗大中祥符末年,天下大旱,百姓生活困难,民不聊生。此时,王旦正在中书省任职,一天傍晚,王旦下班后往家走,途中路过一家酒店门前,有一个叫王行的狂生正坐在酒楼上喝酒,由于喝多了,所以说说话肆无忌惮,看见王旦后,便指着他大喊道:“百姓们遭受旱灾,穷愁困苦,你却稳稳当当地享受着朝廷丰厚的俸禄,心里就这么坦然吗?”说着,竟然随手抓起一本书,向王旦打来,正好打中了王旦的头部。左右随从一拥而上将王行抓住,准备将其扭送到执法部门,却被王旦拦住了,他说:“这个人说的话,正好说中了我的过错,他何罪之有呢?即使打了我一下,也不过是一时兴起,况且没有打伤,为什么要追究他呢?”于是命令众人将王行放了。

后晋开运年间,冯道被任命为中书令,有人不

## 《浮生六记》佚稿之谜

□ 李健

清道光年间,杨引传在苏州地摊上发现《浮生六记》手稿残本,缺少《山中记历》与《养生记道》两记。光绪三年,他交上海申报馆排印出版时是残本,以后陆续再版,转登的《浮生六记》都只有四记。1935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生活名著丛刊》收录了《浮生六记》足本,说已找到后两记的钞本,轰动一时,读者都信以为真。然而,据湖州人文学者徐重庆考证,后两记其实是南浔人王均

卿所作。

王均卿是光绪九年的秀才,国学根基扎实,曾在沪上多家出版机构担任总编或编辑,与创办全国第一家体育学校的同乡徐一冰合编过《体育杂志》。1986年,徐重庆写信给王均卿的女婿季小波求证此事,季小波在回信中明确告之:“《浮生六记》后两记实际上是我岳父所作,沈三白的闺房乐趣吸引了他。”季小波是现代著名漫画家,1935年前后,他们夫妻就借住在苏州北塔寺旁边的岳父家中,他所说的应该真实可信。

## 嫉妒成就画驴大师

□ 李云贵

北宋皇帝宋徽宗喜欢书画,并且有很深的造诣。一天,他在汴京市面上看到有人专卖驴画,问随从:“天下何人画驴最好?”随从回答不出来,便四处打听画驴出名者姓名谁。被问者中大多说有个姓朱的画家是专门画驴的。那画家叫朱子明,原本是一位很有功底的水画家。于是,宋徽宗就召朱子明进宫画驴。当他接旨进宫为皇上画驴时,简直哭笑不得。朱子明在当时很有名气,同行们忌妒他,便四处造谣,贬低他,说他是个驴画

家。其实,朱子明根本不会画驴,他是一位山水画家。哪知皇上将他人对朱子明的贬辱当真。朱子明进宫后便硬着头皮开始画驴,放弃了作山水画,先后为皇上画了数百幅,最后终于得到皇上的赏识,真正成为了“天下第一画驴人”。

事后,朱子明十分感慨地说道:“嫉妒是坏事,也是好事。感谢嫉妒者,你们的骂声、贬责和造谣成就了我!”朱子明是一个心胸宽阔之人,人家造谣,贬低他,他却让嫉妒者鞭策自己,努力地去学习,潜心画驴,实现了精彩的人生,终于成为后人难以超越的“天下第一画驴人”。

◎ 老照片

每一幅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  
每一个故事后面,都有一段历史



农民也能享受体检啦

改革开放的春风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上世纪80年代,民营经济起步较早的贵岩县新前镇多方筹措资金,加大社会福利事业建设力度,完善社保体系。图为该镇组织医务人员为老人们体检。

照片提供者:黄政

◎ 史海钩沉    □ 陈宝国

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宋高宗赵构一路南逃,颠沛流离,几经辗转最后定都杭州,两浙成为拱卫京师的重地。除了京师临安府(杭州)外,浙东首善之地绍兴在南宋地位十分重要,对赵宋帝室而言意义尤其特别。

绍兴给了艰难困苦中的宋高宗庇护和希望。绍兴地理位置优越,西与杭州距离仅百里左右,一日夜舟车可达,而且从绍兴到明州(宁波)便可直接入海躲避金兵锋芒。建炎三年末、四年初,“兀朮犯临安府,守臣康允之弃城走,钱塘县令朱晞死之”,宋高宗便从绍兴出发往宁波出港航海避兵,“帝乘楼船次定海县”“移幸温、台”“泊温州港口”,在浙江沿海漂泊数十日。等金人退兵后,宋高宗又从海路返宁波,再从陆路回绍兴。根据《宋史·高宗本纪》记载,南宋初年宋高宗两次长时间驻绍兴,共计1年8个月左右。绍兴除了是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同时也给了宋高宗一个赵宋王朝美好未来的希望。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驻跸越州,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下诏从建炎五年正月

起改元绍兴。“(绍兴元年)冬十月己丑,升越州为绍兴府”,一个府以在位皇帝的年号为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足见宋高宗对绍兴的重视和对赵宋江山的美好祝愿。

绍兴是南宋两位皇帝的龙兴之地。宋王朝南渡后,赵宋宗室多住在绍兴,这些宗室中还产生了两名皇帝。南宋在位40年的宋理宗赵昀(1205~1264),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宋史·理宗本纪》:“讳昀,太祖十世孙。父希璘,追封荣王,家于绍兴府山阴县,母全氏。以开禧元年正月癸亥生于邑中虹桥里第。”宋理宗出生在绍兴山阴虹桥里,是宗室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宋度宗赵禔(1240~1274)是宗室荣王赵与芮之子,宋理宗没有儿子,收其为养子,1264年10月继位。《宋史·度宗本纪》:“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讳禔,太祖十一世孙。父嗣荣王与芮,理宗母弟也。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于绍兴府荣邸。”宋度宗也是土生土长的绍兴人。

绍兴还是南宋诸帝陵寝所在地。在古代,皇帝陵寝制度十分讲究,皇帝陵寝所在地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往往十分崇高。《宋史·徽宗本纪》:“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国城,年

五十有四……十二年八月乙酉,梓宫还临安。十月丙寅,权殡于永佑陵。”《宋史·高宗本纪》:“冬十月乙丑,始听中外用乐。丙寅,权攒徽宗皇帝及显肃皇后于会稽永固陵,懿节皇后祔。”宋徽宗永佑陵初名永固陵,是南宋在绍兴建设的第一个帝陵。此后,宋高宗永思陵、宋孝宗阜陵、宋光宗永崇陵、宋宁宗永茂陵、宋理宗永穆陵、宋度宗永绍陵等著名的南宋六帝陵寝均建在绍兴永佑陵附近。古人事死如生,对死者的身后安葬之所往往十分讲究,尤其帝陵更是关系王朝盛衰的大事,选择陵寝所在都十分慎重。宋高宗选择在绍兴建立陵寝安葬宋徽宗,足见绍兴在帝室的重要地位,绍兴真乃赵宋帝王身之所葬、魂之所牵也。

南宋帝室之重绍兴有目共睹,绍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地位也于南宋时期达到了极致。南宋初期著名大臣、文学家王十朋称赞绍兴府城“栋宇峥嵘,舟车傍午,壮百姓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著名爱国诗人、绍兴乡贤陆游更称“今天下巨镇,唯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可见,南宋是绍兴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